

ZHONGJIUNAOCAO
BIANHUA SHEHUIZHONG DE
ZHENGZHIWENHUA XUSHI

钟九闹漕：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叙事

邓建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钟九闹漕：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叙事

ZHONGJIUNAOCAO
BIANHUA SHEHUIZHONG DE
ZHENGZHIWENHUA XUSHI

邓建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九闹漕：变化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叙事 / 邓建新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303-11728-4

I. ①钟… II. ①邓… III. ①政治学—理论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284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mm × 235mm

印张：21

字数：335千字

版次：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策划编辑：祁传华

责任编辑：祁传华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毛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一部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作品

(代序)

当了七年多的博导，已指导通过了五六篇学位论文，但给学生即将出版的著作写序言却还是第一次。尽管并不怀疑自己的学术眼光，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也大体证实了我的判断，但到落笔时心里却总有些忐忑的感觉。

落笔迟疑，首先是因为著者的研究意图。

四年前的一天，刚刚入学不久的小邓找我聊论文选题。他一说出大致的想法，我几乎没有犹豫，当即表达了对他选题和研究意图的赞赏。

多年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一定是能够小中见大问题。惟因其小，方能穷尽相关资料，做得仔细、周详；惟因其能够小中见大，方能避免琐碎，显现出一定的格局，不失其理论价值。但是这样的选题，对大多数博士研究生来说，都太过困难了。

我认识小邓，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那时还在读本科的他，给我留下了勤奋好学、思维敏捷的印象。虽然本科毕业后，他做了很长时间的行政工作，但对他的学术潜力，我一直

还是怀有相当的信心的。

不过，赞赏他的选题，鼓励他知难而上，还有更重要的学术理由。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的研究兴趣一直游走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间，其间，无数次萌生了范式批判和创新的冲动。为此，我也在研究中作出过一些尝试。

阿尔蒙德确定的政治文化经典研究范式是国内政治学界早已熟知的，某些接受过正规政治学教育的学者甚至认为唯有采取这一范式作出的研究才能算是政治文化研究。这一将传统的规范研究完全排除于政治文化研究之外的认识并没有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国内大多数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仍选择使用规范研究方法来完成他们的论著写作。这固然与这些学者原有的方法论训练经历以及知识结构有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将阿尔蒙德范式看做是政治文化唯一可行的研究途径的确太过绝对了。

实际上，“政治文化”概念本是从文化人类学领域舶来的。以探讨人类行为动因为目的的文化人类学虽然强调观察，但追溯行为动因的观察并没有完全排斥文献研究的地位。直接观察适用于存在于当下的人群，而对过往曾经存在的人群的观察，却只能采取间接观察的方式，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无疑是形成间接观察的重要途径。研究当下存在的政治文化，固然可以采用观察“刺激—反应”的方法，确定某些政治行为的动因，但是对已经湮灭在时间长河中的政治文化，是不可能采取同样的办法加以观察研究的。所以教条地迷信阿尔蒙德范式的最直接后果是需要将非当下存在人群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等相关内容排除于政治文化研究之外，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可能性。

但是破除阿尔蒙德的所谓经典范式迷信，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范式所展示的政治文化研究科学化的努力方向。对人群或个体行为动因的探究，毕竟是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而唯有不偏离这一目标，才有可能不断推进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化进程，才能使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对政治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形成某种程度的解释能力。为此，我一直坚持认为“思想史不等于文化史”，反对将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文化混同起来的做法，而摸索传统政治文化新的研究途径，实现某种程度的范式创新，写出别样的政治文化研究作品，始终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

小邓的选题，在我看来，也具有类似的尝试性质。选择“钟九

闹漕”这样一个地方性历史事件，以这一事件不同的叙事文本为分析对象，引入话语分析等相关理论，通过比照不同时期或不同身份的群体对这一事件的记忆和叙事之异同，考察中国政治文化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的变迁，凸显主流政治文化与相关亚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互动。如此这般，哪怕是部分实现了写作意图，也可能诞生一部很有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作品。

形成一部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研究作品，是我对小邓论文的真切希望。现在看来，这个希望并没有落空。

小邓的论文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钟九闹漕”的历史考察。在这里，他收集了大量资料，详细地考订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其间，他运用了集体行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事件由一般性冲突最终演变为武装叛乱的原因，较深刻地展示了19世纪中期崇阳各社会阶层的相关利益诉求、利益冲突，以及官府在解决冲突过程中的决策过程，揭示了消解各种民间及官民之间利益冲突的制度性困局。

另一条主线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叙事对象的不同文本。这些文本或者形成于不同的身份阶层，或者形成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下。作者注意到形成于大体同一时期但不同的身份阶层的文本之间的叙事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对该事件的价值认识上。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价值认识上的差异也影响了部分事实叙述，从而形成了不同文本之间的事实认识差异。作者将这种差异放置在主流政治文化与亚文化这一理论平台上解释其形成的缘由，同时，也没有忘记提醒读者，主流政治文化对亚文化有着极强的塑造作用，它的持续而持久的影响，对亚文化会形成强大的压迫力量。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文本的深度分析，作者发现，某种亚文化的习惯性认识或话语，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都已经变成了农民的潜意识——只有在受访农民不留神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从他们的嘴里溜出来。

当然，作者更加关注的是不同时代环境下形成的该事件文本之间的差异。从“钟九闹漕”到今天这160多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艰难而悲壮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注定也是中国文明脱胎换骨般的涅槃过程。仅就主流政治文化而言，其间，经历了儒教大厦的轰然垮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主义”的竞争。作者注意到，“钟九闹漕”这一发生在道光年间的地方性事件，因为不同的政治需要，在这一时期往往被善于“古为今用”的革命者所利用，于是便又产生了若干有着不同叙述风格的文本。

作者发现，这些文本的首要特点是“主题先行”，完全服从政治需要，叙事上无一例外都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取向加以统领，进而，彻底贯彻了当时主流政治文化的基本思维方法。因此，“钟九闹漕”在1927年的武汉文本中，第一次被描述为“农民革命运动”。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本中，钟九等下层乡绅因代理农民缴纳田赋事务而与文吏之间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又被叙述为农民与地主这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尽管这些文本大体上体现着同一种主流政治文化取向，但是作者通过仔细阅读，仍然发现了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异。1927年的文本，将“钟九闹漕”阐发为“农民革命运动”，甚至阐发为“世界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是希望以此为“大革命”中的农民运动辩护，但总的来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阶层的启蒙意识和动员下层社会的需要。但是1957年以后，主流政治文化全面统治了文本写作。在对1957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文本的解读中，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国家唯一幸存的文化就是主流政治文化的时代，任何非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都只能以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形态存在，所谓政治文化中的“亚文化”至少在显性层面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是以公开的文本形式存在了。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对国家暴力的恐惧与畏服，同时，也表明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传播，其背后都是以国家的体制性暴力为后盾的。

除了上述两条主线外，作者还试图通过文本分析，从一个侧面展示乡村社会的近代变迁过程，揭示乡绅阶层由分化到解体再向城市知识分子转移并最终被国家暴力驯服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本书中多少有偏离主题的嫌疑。一个科研课题或一部学术著作，本不应该承载过重的研究使命。对这一问题的偏爱，以及对后现代话语分析理论的过度阐发，都反映了刚刚踏上学术研究之路的青年学者的稚嫩。但或许也正因为有着如此的青春稚嫩，也才能完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作品。

但愿能够有幸和我一同分享这部作品的朋友们，能够在阅读中得到更多的灵感，写出更多的别样的中国政治文化作品，以多样化的写作实现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创新。

杨 阳

2010年10月

.....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政治文化的话语分析/1

一、被忽视的语言	1
二、话语和政治	10
三、政治文化的再认识	24
四、深描政治文化	35
五、为什么是“钟九闹漕”	54
六、本书的写作路线图	63

第二章 钟九闹漕：传统社会的集体行动/66

第一节 道光王朝的力量	66
一、皇帝和臣僚	66
二、军事动员	71
三、安抚地方	75
四、政策调整	77
第二节 崇阳的地方社会	80
一、山区的民风	80
二、溃不治事的官府	88
三、鱼肉百姓的书吏	95
四、走向县治的下层绅士	101
五、稍逊风骚的士绅大户	107
第三节 从抗粮运动到武装叛乱的文化解释	111
一、抗粮诉讼：并非理性选择的行为	111
二、拆打粮房：无意对抗官府的集体行动	121
三、破城戕官：在激变中走向武装叛乱	129

第三章 革命：激变时代的精英叙事/141

第一节 革命文化的兴起	141
一、崇阳农民革命运动	141
二、传统中国的“圣人革命论”	143
三、革命话语嬗变中的激化倾向	150
第二节 精英与民众的文化分立	163
一、“钟九闹漕”的国民革命化	163

二、“革命”唤醒大众？	188
第四章 继续革命中的文化表述/201	
第一节 文化规训中的反精英意识	201
一、人民史观对传统文本的改造	201
二、建构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	212
第二节 乡村革命文化的衰退	225
一、崇阳农民的阶级意识	225
二、文化资本和乡土观念	245
三、极端的革命文化叙事	263
四、民间记忆向革命告别	280
结语：文化变迁的踪迹和理由/288	
一、王朝政治：绅民一体的文化共享	288
二、革命：精英主导的文化突变	292
三、国家与社会：革命文化盛衰的一种解释	297
参考文献/301	
后 记/323	

第一章 导论：政治文化的话语分析

一、被忽视的语言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学领域并未重视语言问题，甚至在政治文化这个与语言或使用语言密切相关的分支领域，相关的论述也是少见的。^① 长期以来，语言（语音和文字）被认为是透明的交际工具，它能够准确无误地承载意义，藉此人们相互之间可以真切地把握交流的信息。语言就像火车，能够通畅无阻地在铁轨上往返运输，并在不同的站点装货卸货。作为每天使用语言的普通人类，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对语言的感受并不例外。但实际上，语言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起着某种“日用而不知”的特殊功用。从研究政治文化的通用方法或途径来看，学者们漠视语言特有的潜在功用是普遍的现象。

自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端起，政治文化领域的研究一般采用抽样调查法、面对面访谈法和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法。学者们对这三种方法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得失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② 但是众多评论中少有从语言的角度对之进行再思考，而这三大方法在运用中忽视语言潜在功用的习惯做法却可能给研究结果带来较大的偏差。在从语言潜在功用的角度分别进行评论以前，必须指出这三种研究方法无时无刻不在依赖并运用语言。这一事实可能使包括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抽样调查法是从社会学和统计学中借鉴而来的方法，注重实证性与精确化，一般来说，其结论是可以验证的。运用这一方法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示范性著作当然是阿尔蒙德和维伯（Sidney Verba）

① 但是研究（英语）语言或文论的学者关注“政治”的并不少见，见后文阐述。

② 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11～5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这项研究历时五年，耗费巨资，在各国动用了大量的调查人员，主要采用抽样调查并结合入户访谈（该研究设置的是程式化的问题，不同于面对面的访谈）的研究方法，最后依据大量的数据总结而成。^① 我这里无意质疑这部著作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典范地位，仅从跨语言层面可能造成的干扰提出疑问。

阿尔蒙德和维伯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语言对其研究造成的干扰，他们在该书的第一部分“此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谈到了这一问题。在该项研究中，作为比较研究的普遍性问题——“等值问题”，一是采访情境的标准化，一是对调查得出的结论的翻译。前者要求各国的调查者与受访者处在大致相同的情境下采集和提供资料或信息，这样调查所获取的资料数据才能够进行比较分析。这里“情境”主要指“词汇”即调查问题的语言对受访者的“刺激”作用。这一刺激作用好比加在不同弹簧上的重量，只有重量等值，才能对弹簧的力量进行测量。由于调查的问题是由英语翻译成他国语言，非英语国家的受访者是使用非英语的母语提供信息，这一信息必须再翻译成英语才能进行比较分析。但是，被翻译成英语的信息有可能失去了它在母语表述中的相对含义。这就是如何翻译那些在非英语国家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用阿尔蒙德和维伯的话来表述就是他们“还必须选择政治行为的等值方面”以及“这些方面的指标”。

面对语言问题给比较研究带来的困难（实际上造成这一困难的因素还有很多，语言只是最显性的罢了），研究者通过精心翻译（几个来回的盲翻）采访问题，尽量避免使用抽象词汇而选择具体词汇，采用强度提问和二分法答案，使用开放性问题等措施来减少语言造成的不等值的麻烦。尽管如此，两位政治学家还是坦率地承认“没有任何跨国研究能够避免”诸如此类的翻译和情境等问题。但是阿尔蒙德和维伯认为，情境结构基本上不能决定行为和态度，而态度的类型和行为也相对摆脱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结构的约束。因此，尽量设置一些诸如“你认为你能够影响政府吗”这样反映受访者个人与政府的关系的主观见解的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同的政

① [美] 阿尔蒙德、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治结构而带来的比较上的偏差。同时，“通过各国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的相同和不相同等方面来表述在两国之间所进行的比较，人们就多少掌握了这些变量的含义在国与国之间的差别”^①。

作为严谨的学者，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关于公民文化的研究中将语言问题视为条件变量^②纳入分析过程，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最后他们又试图用化约的方法将语言造成的差异全部抹去，给这项研究的信誉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削弱。一些学者批评这项研究的重大缺陷是以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生活为样板，来对其他国家进行评价。的确，他们的研究明确将英美两国视为“稳定”和“成功”的民主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公民文化”^③。在此基础上再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考评，可以说是类似于“东方学”^④的翻版。从方法上看，招致这一批评的重要原因在于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上去除了语言差异（或翻译）这一条件变量。研究者虽然在努力寻求一种语言上的等值，但是，在翻译中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的等值仅仅是一种喻说：

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或与利益冲突无关的中立事件。实际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客方语言在那里被迫遭遇主方语言，二

① [美] 阿尔蒙德、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64～82页。

② 条件变量是构成前提条件（能激发或扩大因果规律或假设的作用的现象）的变量，它的值制约着自变量或中间变量对因变量和其他中间变量的影响程度。例如在“只有得到降水的情况下，日照才能促使生长”的假设中，日照是自变量，生长是因变量，而降水量就是条件变量。参见[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9～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 [美] 阿尔蒙德、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517页。

④ 参见[美]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萨义德思想述评参见[英] 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李自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者之间无法化约的差异将一决雌雄，权威被吁求或是遭到挑战，歧义得以解决或是被创造出来，直到新的词语和意义在主方语言内部浮出地表。^①

如前所述，阿尔蒙德和维伯试图消除语言差异带来的困扰，实际上最后通过简约化处理弃之不顾。也就是说，在“问题和回答显示取向和态度，归纳取向和态度就可以描述和比较政治文化”的假设中，“问题和答案由语言来表述，同一问题（及其答案）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具有不同（或相对）的意涵”这样涉及条件变量的假设就被省略掉了。忽略乃至抛弃这个客观存在的条件变量的后果就是，使他国的文化经验服从于英语国家（主要是美英）文化经验的表述，从而在抹平两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再建构出某种文化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文化》一书在规范概念类型上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其在方法上的成就。因此，阿尔蒙德和维伯关于公民文化的研究在规范学科概念和研究范畴方面为后继者树立了典范，但是他们在方法上忽视语言差异，继而在抹平不同语言乃至文化的差异之后，再重新建构文化差异的做法削弱了研究结论的效用度和说服力。

针对上述由语言差异引起的文化理解上的困扰，以运用资料与历史文献方法研究日本文化而享有盛名的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曾如此评论道：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查美国人的意见，并了解调查的结果。但他们能够这样作，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要了解一个国家则必须先对那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质量的研究，然后投票方式才能有用处……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抱有什么样的观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的国家观之后，我们才能弄清楚各个派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36页，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①

太平洋战争后期（1944年），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开展研究。不同于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当时美国对日本不太了解，委托各方面专家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两个大问题：一是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美国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德国的办法？二是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报告于1946年整理成书，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为书名出版，在日本引起轰动，后来重印达几十次之多。^②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描写日本文化的著作，能够在日本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除了本尼迪克特本人的敏锐学识和严谨的写作风格之外，在方法上重视语言差异导致的问题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于研究正值战争期间，本尼迪克特无法采用实地调查或抽样统计的方法来完成这项研究，只好采用：（1）个案调查法，即与当时居住在美国但是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接触、交谈；（2）解读各种相关文本，其一是大量阅读出自西方人和日本人之手论述日本的书籍、文献（包括政治演说和日本文学作品），其二是观看许多在日本编写并拍摄的影片，并与日本人一起仔细讨论。在运用两种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母语为英语的本尼迪克特必然在英语和日语之间进行“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无论本尼迪克特对日语的熟悉程度如何，她在研究中始终重视并充分强调了语言差异引起的理解问题。《菊与刀》第一章题为“任务——研究日本”，主要论述该项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她在其中明确说：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其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而加以磨练。^③

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

①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13页，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② 同上书，译者序言。

③ 同上书，7页。

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学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达。^①

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楚了西方人的观念与他们的人生观不符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经常看到的日本人行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就发现，他们最初用的那些奇特词句和概念，一变而为具有重大含义，并充满长年积蓄的感情。同西方人所了解的道德观、罪恶观有着巨大的差异。^②

尽管文化理解上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由语言的不同而引致，但是语言最显著地体现了这一差异。在写作的过程中，本尼迪克特保持了对这一现象的高度警觉。我们不妨再引用一段文字，表明本尼迪克特是如何保持对语言问题的敏锐感觉的：

中文和日文当中都有许多词汇表示英语中的“obligation”（义务）。这些词汇不是同义词，其特殊含义也无法译成英文，因为他们表达的观念对我们是陌生的。日文中相当于“obligation”，表示一个人所负的债务或恩情的词，从最大到最小，都称作“恩”。其用法，可译成一连串英文，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但这些词都不免歪曲了原意。^③

在整个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中，本尼迪克特使用日文的小学课文、小说、日本精神分析杂志上的咨询案例、常人对话情景来向英语读者解释日文中“恩”涉及的观念和思维。而在第十章“道德的困境”中，引用大量日文的语料进行分析，其写作接近本文后面将要介绍的话语分析方法，尽管“话语”一词在 20 世纪 40 年代并未兴起。可以说，本尼迪克特重视语言对文化理解的规制作用，

①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9 页。

② 同上书，14 页。

③ 同上书，68～69 页。

为其描述更接近真实状态的日本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也为她的这一研究赢得了声誉。可以说，作为人类学家的本尼迪克特悄悄地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预留了一扇语言的大门，尽管她还并未将语言问题提高到方法论的层面来专门讨论。

至于面对面访谈法，我不打算在这里举例讨论。正如我在后文中将要指出的那样，但凡稍稍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思考文本应当如何阐释这一问题的学者，都会赞成在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和解释政治文化的过程中，语言（或话语）充当了更为关键的变量。下面我将讨论在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暂且可以被命名为“典籍研究法”。同时我将简单介绍剑桥学派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重视语言维度的范式，以进一步反观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忽视语言潜在功用的做法。

这一方法之所以可以被命名为“典籍研究法”，主要在于这一类研究脱胎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政治理论经典和政论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或“传统政治文化”。这里暂且不讨论这一类研究与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在学术范畴上的差异^①，而是同样要指出在这一类研究中忽视语用学（pragmatics）^②层面的事实。典籍研究法的研究过程就是在古典文献（实践中多为成文经典和国家典律）中逐字逐句地“读出”（read off）政治文化或者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作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读”之后再对所读文本进行阐释，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得出结论的方法和途径。但是，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应当尽量考虑历史的语境（广义的），不能混淆“当代的理解”与“历史的理解”。当然，绝对的区分是不可能的，研究者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来自

① 这种差异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4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② 简单地说，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如何使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语用学大体包括研究特定语汇和语言结构的语用属性、说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听话人意义（hearer meaning）、语篇意义（discourse meaning），热点是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四个研究面。语用学兴起的学科基础包括语言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倾向，以及哲学的日常语言学派（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实际使用及相关问题的语言学，它在许多方面与话语分析是重叠的。参见何自然、吴亚欣：《语用学概略》，载《外语研究》，2001（4）。

己的生活经验带入其解释中。这也不仅是是否掌握古汉语的问题（这是一个必要的基础技能），而且是研究者能否坚持学术自觉的问题。国内已有学者对之作出了批判（尽管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①遗憾的是，忽视语言潜在功用带来的偏差，径直进行有关政治文化的阐释并不是个别现象。

忽视语境而径直阐释文本是一个普遍现象，借用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话来说，就是犯了“时代误置”（anachronism）的错误。剑桥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革新直指传统观念史学以经典文本中的“普遍观念”为对象进行超历史的分析的做法，提倡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那些观念和信仰。^②这一方法的要旨用斯金纳的话来概括就是：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③

斯金纳在研究方法论上的革新，其灵感来自语言哲学。其一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其所著《哲学研究》中所讲的“语言游戏”的思想，最简洁的表达就是“意义即

① 参见杨阳：《儒学：难道是魔术师的口袋？》、《必须对于丹的〈论语心得〉说“不”》，载《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当然，CCTV“百家讲坛”栏目中一些学者的历史和文化讲座更是这种“误读”的集大成。

② [英]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第一辑），95～1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③ [英]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8页，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转引自李宏图：《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载[芬兰]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李宏图、胡传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